



小记者

##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笔谈

# 我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认识

李鸿宾

2022年1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部署会暨编委会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简称《三交史》，下同）工作的正式启动，这项工作大致由《三交史》的系列著作和史料汇编两个部分构成。

作为历史著作的编纂和撰述，在当下中国大陆持续不断的热潮中如何加以定位及其特点之认定，既是该书编纂之自身的逻辑诉求，也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不可或缺的认识和想法。本文拟对《三交史》著作的编纂意涵和该书之特点略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 （一）高度的政治性自觉

《三交史》纂修的政治性自觉首先表现在，它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

从更广阔的角度观察，国家支撑的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文化工程建设具有更加长久的传统。其中古典社会中国家主导的“官修史书”，无疑是那个时代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体现，贯穿其中的就是人们熟知的“二十四史”之纂修。如果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标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通达古今，洞察人世变迁的话，那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为宋朝的君主“以著朕之志”，旨在“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它为君主治理国家提供借鉴的旨意表达得十分分明，这应当说是中国史学著作的显著功能并以长存的根由。这个传统至少从《春秋》一书的编纂就已形成，递次演化成后世官修史书的模式，至唐朝则完备了国家主导编纂的整个机构及其制度性规范。有如《唐六典》所说：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

唐朝将编修史书纳入到国家战略布局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由当朝宰相“监修国史”规范的出场。以《隋书》为例，最初由令狐德芬监修，后则归属长孙无忌，他们都是唐太宗、唐高宗的当朝显贵；今本署名的“魏徵等撰”之魏徵，更是太宗倚重的朝廷重臣。

如此看，唐朝之如此看重国史的修撰，正是它为当朝治理提供经验和教训的功能所致。由当朝宰相监修、具有高素养且富含职业特性的使臣在国家专门性的机构进行的史书编纂，从此走上了高度专门化和职业化的道路。这一体系完备于唐朝，又影响后世的历朝历代，形成了中国官修史书的独特模式。

正是出于这种国家主导的高度政治性的自觉，官修史书描述的主体放在了“人”而非其他层面。这是因为“人”的活动构成了王朝兴衰替替及其内在规律的主轴，如同唐人刘知已所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对“人”的观察就成为“二十四史”纪传体的核心。从朝廷特定的场合出发，正史里的这些“人”或“人物”并非是个人的每一个人，而是与朝廷命运直接相关的所谓“帝王将相”，即王朝国家运行治理的把关者，应当说，这是国家政治体前后衍化特定阶段的产物，它与人类走向共和制的国家形态完全不同。

以《三交史》为表征的今日国家行为的修史，既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当下再现，也是对历史的超越并以新的内涵赋予进而发生了性质变化。就传统而言，仅从上面的简略论述即可清晰地看到，不论是古典的王朝中国还是现代的共和国中国，史学及其承袭的撰述一直被视作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方针大政而受到关注。如果说欧洲古典文明的重要表征体现在它的哲学思想及其长久承传脉络的话，那么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史学撰述及其思想意涵的表达无疑是重中之重。史学之受到古代王朝持续性的重视，就在于它的“鉴古知今”之作用，而“鉴古知今”有如“曰若帝尧，曰若帝舜，惟圣心稽古之功；鉴于有夏，鉴于有殷”，是将古人的行为道德及其国家治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以被当今王朝所吸收和采纳，目的是搞好“当今”王朝的有效运作。这既是史学受重视的核心，也是它的本质呈现。正是这样，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就成为突出特征，进而与欧洲哲学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形而上”的探求形成了东西文明体系的相互映照。

说它是超越，就在于今日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均发生了本质变化而与古代王朝分隔成古今之不同模式。以全体国民为主体建构的共和体制的国家，一切从人民出发到最终目标的指向人民，使得她与帝王将相主导的王朝国家构成了中国历史和当下这两个既相互衔接又有巨大差别的政治体。正是性质出现了差别，同样重视历史编纂的行为本身也因此而有意涵和特性之差异。王朝国家的“正史”，除了前述那种为君主治理国政提供借鉴之外，政权乃至王朝的法统同样依托史书的修撰得以彰显。更明确地说，修史与王朝的正统名望具有天然般的联系，这既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种诸国林立之时借修史以强化自身法统而成为必要，又在汉唐宋元明清这类中原内外、长城南北为一体的大型王朝时代以修撰史书伸张王统而被宣示。

我们看到，无论是司马迁编修《史记》，还是诸如隋唐、两宋和明清的大规模编史，它们均处在鼎盛状态的一统化王朝之内，这表明：古典中国的分散之中修史寻求自身的正统而视对手为僭越，一统化之盛世撰修展现法统之权威，以“开万方一统之模”，历史著作的编纂与王朝命运之息息相关，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今日的修史当然与王统毫无干涉，中国早已摒弃了王朝模式，今日的史书撰述以人民为核心特质，但修史蕴示的国家法统这一功能并不因此而丧失，这是因为人民共和国的法统同样是国家仁立的法理依据。更重要的是，这个法统亦内含于国家的文化建设之中，并通过精神文明塑造中国的发展模式而呈现，也就是法统与国家自身的发展相互统一。如同经济建设夯实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那样，文化的塑造同样构筑了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二者兼具且相辅相成，目标就是强化国家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而论，今日《三交史》的修撰应当是在继承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进行新突破的一项文化工程。

### （二）深广厚度的学术探索

《三交史》除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之外，它本身也是颇具深广厚度的学术探索。

它的历史传统就是古典王朝修史

表征的以“正史体尊，义与经配”著称的二十四史。从编纂和监修主持人员的选拔、撰写体例的确定、编写规则的颁布到材料收集并最后成书，历经千百年的磨砺，打造成为适应王朝正统地位并为当政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一套史书系统。这样的行为在古典时代虽说非独此一家，但却以国家支持和主导而自成一统著称于史，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西亚世界的《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名家杰作，均系单独作者抑或合作的修撰行为，虽然他们不乏朝廷宰臣一类的要职者。

《三交史》编纂学术的直接承统，是近代以来有关中国民族史的研讨。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56个“民族”及其构成的“中华民族”，这些概念及其含括的中华各群体，都是受到现代“民族”理念再塑造乃至不断成型的结果。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这里的“自觉”表达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这一群体（或其中的一个部分），是与其他群体区别且具有自我的明确认知而界定的群体，如同梁启超所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这种系统性的认识伴随着近代新型国家的出场，是民族与国家二者紧密对应的产物，它以国家范围内的人群组合与所在国家的命运作明确认知的方式出现，亦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潮和观念崛起和激荡的产物。

相比之下，古典时代的中华国家众多的民族和族群，不具有这种明确的认识，所以它属于费孝通先生界定的“自在”性群体。

正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之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民族主义思想也与之同步进入中国，这就与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发生对应关联甚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因应形势的变化开始探寻中国的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再塑造，于是“民族”“中华民族”就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探索的重点，以与转型的近代中国相契合。

## 古城深处 百书启程

### ——“大同读书漂流计划”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在大同的古城墙下，云冈石窟的佛龛旁，华严寺的飞檐转角处，一场无声的文化之旅正在悄然启程。3处静谧而充满故事感的空间——“六楼咖啡”的窗台、谦益泰茶庄的茶案、山海居民宿的书架，成为为100本精选书籍的起点。它们不只是书，更像被寄托了心愿与温度的“文化漂流瓶”，穿梭于这座千年古城的街巷与山海，完成一次次跨越空间的传递。

9月15日，“读书漂流计划”正式开启。“六楼咖啡”主理人王涛说，它不只是一种借阅，更是一场没有围墙的艺术展、一次绵延不断的文化接力。每一本书，都带着某位陌生读者的字迹与温度，也承载着属于大同的城市叙事。

王涛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图书分享，而是一次有意为之的文化行动。韩晨光、齐嘉丽、张小泉等多位文化名人也为这批书籍赋予了特别的“行囊”：从《公孙龙子》的古典思辨，到《撒哈拉的故事》的远方浪漫；从《大同军堡》的本土记忆，到《茶人三部曲》中流淌的茶香岁月……这100本书，种类各异却心意相通。

每本书都贴有专属编号，仿佛它们不是书，而是一个个已经出发的信使。在书的扉页，藏着一枚精心设计的“漂流卡”，等待每一位遇到它的人写下此时此刻的感悟——也许是一段读书笔记，也许是一句对大同的感慨，哪怕只是一个签名、一个日期，都是这场漂流中最真实的回响。

漂流规则简单却富有仪式感：当你拿到书，请读完它，然后传递给下一个陌生人。至少完成3次传递后，再将这本书放回任意一个漂流点。就像古城中一块块沉默的城砖，这些书也将以文字为媒介，传递普通人的思考与情绪，拼接出一幅属于当代大同的“人文地图”。

## 抗日故事分享会暨《智炸军火库》赠书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炯）9月5日，由平城区委宣传部、区委党史研究室与大同市连环画收藏促进会主办的抗日故事分享会暨《智炸军火库》赠书仪式在平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邀请市民俗专家、党史研究人员及老党员代表结合历史文献与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大同地区抗战时期的英雄事迹。

在《智炸军火库》赠书环节，主办方方向平城区各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中小学校及社区代表赠送了该连环画作品。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抗战时期大同地区军民协作、“智炸军火库”的经典战斗场景。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赠书活动，推动红色故事深入基层，走进青少年，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 诗人张春诗集《岁月，足迹》出版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近日，我市女诗人张春诗集《岁月，足迹》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张春，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大同分行，笔名暖阳，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大同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多家文学平台及期刊，入选2021年、2022年《中国微型诗排行榜》，并在国内诗歌比赛中获奖。主要创作文体为现代诗、微型诗、散文诗、散文。

诗集《岁月，足迹》以家国情怀为主线，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辑“家之篇 一路走来”，以单位日常工作作为素材；第二辑“国之篇 航标指引”，以各岗位阶层对社会奉献和引领精神作为主线；第三辑“情之篇 小我情怀”，以亲情、友情、爱情进行剖析和抒发；第四辑“怀国之篇 岁月足迹”，以热爱故土和祖国山川河流为诗集收尾。

## 浑源县妇联举办共话清廉家风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炯）近日，浑源县妇联特邀二级心理咨询师王秀静开展了“童语话清廉 小家筑清风”主题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家庭积极参与，以亲子互动的形式共话清廉家风，共筑家庭廉洁防线。

活动中，王秀静老师引入欧卡工具，详细讲解了“自愿参与、尊重边界”“尊重个体差异”等使用规则，为现场营造出安全、开放、包容

的交流氛围。在“家规的传承”环节，家长们分享了父辈传承的价值理念与行为习惯，梳理家庭文化的核心脉络；孩子们则通过绘画和文字，表达了对家风的理解与感悟。随后的“卡牌拼贴我的家”活动中，亲子家庭共同挑选卡牌，拼贴出“心中的家”，借助卡牌传递家庭情感。在交流选卡理由的过程中，家庭成员进一步增进了对彼此的理解，深化了对家庭的认同。

## “阅读古籍”系列沙龙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炯）日前，“阅读古籍·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沙龙活动第一季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特邀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张三玲老师担任主讲，以《墨学“十论”及墨学的衰亡》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近20位读者参与。

讲座中，张三玲老师从墨子生平、墨学“十论”及其衰亡历程三个维度展开系统阐述。她详细解读了墨子提出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深入剖析了墨家

思想的核心内涵，并与儒家学说进行对比，凸显两家异同。此外，张三玲还细致分析了墨学在不足200年间由兴转衰的历史原因，见解独到，激发了现场读者的浓厚兴趣。

据了解，“阅读古籍·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沙龙活动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主线，计划共举办六季，分别聚焦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及明清文学。

# 记录古城变迁 留住时代印迹

### ——记柳敏和他的纪实摄影作品集《大同古城变迁》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在大同古城文防火爆之时，由市文旅局参与策划设计，一部反映大同古城变迁的大型纪实摄影作品集《大同古城变迁》近日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在市文旅局多方面开拓旅游资源，在全面助力全市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大同古城变迁》就是集中展示大同古城今昔巨变的纪实摄影作品集。该书由大同市文化艺术学校退休教师柳敏历时4年编撰完成，选用图片350余幅，其中包括气势恢宏的长卷式构图15幅，从城墙、街巷四合院、古迹寺庙三个方面，多角度展现大同古城近年来发展变化，真实记录发生在古城内的高光时刻和细微温情瞬间。

柳敏，是一个很难用单一标签定义的人。他沉默寡言，气质谦和，却总透着一股“闷声做大事”的笃定与韧劲，不时有令人拍案叫好的举动。作为大同市文化艺术学校的一名教师，摄影是他投入深沉热情的业余挚爱。2006年，由他导演、拍摄的32集系列短剧《刘主任的和谐社区》曾在央视二套播出，显出他不凡的叙事能力。他亦钟情写作，小说与评论文章见于《山西文学》《黄河》《佛山文艺》《山西文学》等刊物。他还倾情研究大同四合院和古城街巷，2009年，《大同日报·假日特刊》专门为他开辟专



栏，系列文章深受读者好评。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跨足表演，与著名导演贾樟柯私交甚笃，并曾在《江湖儿女》《任逍遥》《天注定》《山河故人》等多部电影中饰演配角，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人生百态。

而最近，由他精心编纂、厚重如城、震撼人心的《大同古城变迁》终于正式出版。这本书凝聚了柳敏多年跟拍古城变迁的心血，“闷声做大事”也在此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柳敏回忆道，2008年，大同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古城保护与修复工程。那一年，经友人推荐，他受聘担任大同古城建设指挥部的摄影师，负责全程跟踪记录建设过程，留存历史影像。起初，他只是承担动态视频的记录任务，但很快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同步拍摄静态照片？于是，他购置相机，开始了双线记录的征程。谁也没想到，这一拍，便是十余年的光阴，在时间的沉淀中累积出别样的厚度与温度。

他说，刚开始拍摄时，内心其实是迷茫的。古城几乎一天一变样，未来的面貌根本无法预料。但他始终秉持着一份对历史负责、对工作认真的态度，不断琢磨拍摄的角度与方法。渐渐地，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影像记录体系：既有宏大视角的全景覆盖，也有中观的轮廓勾勒，更不乏局部的细微刻画；既设置固定机位保证连续性，也随时调整应变



捕捉突发瞬间。

然而困难仍层出不穷。比如对建筑体量判断不准，对周边环境变化的预判不足。常常一个建筑刚拍完，旁边就要新建其他设施，导致原先的构图与设想被打乱。面对这些难题，柳敏选择不断拓展素材的收集范围，依靠耐心与细致，尽可能全面地覆盖每一个角落。他说，这是为古城写史，必须尽心尽力。

通过镜头，柳敏也进入了一个又一个陌生而精彩的领域。古建中蕴藏的传统文化和技艺——壁画、泥塑、彩绘、石雕、砖雕、木雕，以及丰富的地方民俗，常常令他目不暇接。起初只是外行看热闹，但越深入越觉其中别有洞天。各种构件的名称、图案的寓意、行业的术语，不断激发他学习的兴趣。“学无止境，乐在其中”，他这样总结。

除了建筑本身，柳敏更将镜头对准了“人”。在热火朝天的工地现场，他目睹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工程师、画家、传统匠人、外来民工……他被这群默默付出的“工匠”所打动，特意以他们为主题创作了组照《大同建城工匠》，后参展平遥国际摄影展，广受好评。柳敏说，城市归根结底是人的聚集，是无数工匠智慧与劳动的结晶。许多当时看似普通的劳作场景，再回看时才会迸发出纪实摄影特有的震撼力。

如今，当柳敏重新走在那些曾经日